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虽说刚刚从“文革”梦魇中苏醒过来，但要真正摆脱“左”的困扰，还需待以时日。

1983年适逢马克思逝世百年祭。中央考虑届时举行隆重热烈的纪念活动，活动分两个层次，一是由中共出面，召开纪念大会，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讲话；二是召开学术研讨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教育部牵头，请周扬做报告。

1982年秋，王元化当时还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担任领导工作。一天分社党委接到市委的电话，说中宣部来电叫王元化去北京。9月底，王元化乘飞机抵京。在中宣部，大家首先研究为周扬文章主持起草的人选，有人提出要王元化来担任。

王元化推说自己工作中断20多年了，复出不久，有些情况不了解，故接受这项工作有困难。但是讨论下来的结果，大家还是觉得让他负责比较合适。

会后，王元化请顾骧陪他去看望周扬同志，周扬此时正住在北京医院治疗腿疾。

在周扬的病房里，王元化见到了周扬。

周扬劈头就问：“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要找人写文章，要我参加起草吗？”王元化有些惊诧。

周扬的记性有些差劲。经王元化这么提醒，他这才恍然想起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年文章的事，“前些时候，我曾经说起要找几个人一起谈谈，比如上海的王元化，可是现在我生病躺在医院里，怎么能写呢？”这时王元化才明白，原来是贺敬之下令叫他来的。他又到隔壁病房去看贺敬之。

贺敬之热情相迎，但被护士严厉阻拦说他是病毒性感冒不能会客，不顾贺的“只谈五分钟”的要求，没有商量余地将两人拉出他的病房外。

回去以后，王元化和顾骧商量，并建议题目定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但是由于周扬患病，工作无法进行，再加上来去匆匆，临时之间，手头资料也缺乏。所以王元化只在北京呆了两天，就返回上海。为周扬起草报告之事暂时搁了下来。

1983年春节前四天，王元化收到周扬来信，说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要他到天津迎宾馆。春节后的2月25日，王元化赶到天津，抵达周扬同志下榻的天津迎宾馆。顾骧与王若水晚些时候到达。这时，他们几个人明确地知道了自己的任务是协助周扬同志起草马克思忌辰一百周年报告稿。

人都到齐了，第二天周扬和王元化等人就共同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年讲话稿，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由王元化统稿，周扬同志定稿。

他们一开始先讨论写文章的事，这样用了整整三天。

讨论的时候，王元化说：

“现在许多文艺问题说不清楚。由于文艺思想都有哲学、美学的背景，如果不在哲学上弄清，许多文艺理论问题就谈不深，谈不透，所以最好先从哲学方面弄清楚。”

周扬同意王元化的意见，让他与王若水、顾骧三个人就这个问题进行准备，并指定第一天由王元化谈，第二天王若水谈，第三天顾骧谈。

王元化主要谈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他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贯穿在他的一切理论之中。理论界对这两论也作过很多探讨，问题也很多。有些和文艺理论也有直接的关系，很值得我们研究。他提出，在这里所要谈的是从感性到理性的问题。

王元化认为把认识过程概括为由感性到理性自然是对的。但不要忽略在感性到理性之间还有知性的阶段。知性也是不同于感性认

识的抽象思维，但这种抽象思维和作为理性的抽象思维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我们不能把它视为可以达到对事物的全面的、本质的和内在联系的认识。理性具备这种认识功能是因为它是辩证的，而知性认识是形而上学。感性、知性、理性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提法，而且也是马克思的提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具体阐明了感性、知性、理性的认识过程，并且还说这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

第二天，王若水谈的是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第三天顾骧也讲了他的一些看法。三个人的发言都由周扬秘书丁春阳整理成记录稿，经他们本人修订后再交周扬。过了两天周扬经过了酝酿，又召集他们三个人，对他们说，他考虑就用他们的发言稿作基础，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分四个问题，即后来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四个部分。

讨论中王若水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有很多发挥，希望这个问题成为文章中的重点。

周扬对知性问题很感兴趣，让王元化写进去。

王元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发表过文章，如果写进去变成你重复我的观点，这不大好。”

周扬说：“那没有关系，你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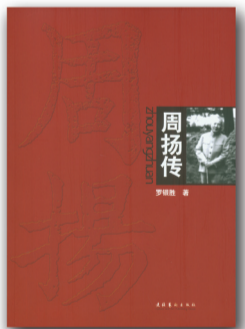


1983年，周扬（前左）、王元化（前右）、顾骧（后左）、王若水（后右）在天津迎宾馆合影

在这篇文章中写明我赞成你那篇文章中的论点。”王元化只好尽量从不同角度来写，这使他写得很吃力。他们讨论结束，三个人就按周扬的意见分头去写，写好交他审定。

对此，王元化后来在《〈读黑格尔〉序》中也谈到过，这里不妨摘引其中的一段：“一九八三年初，我们在天津迎宾馆为周扬起草那篇惹起一场风波的讲话稿时，他听到我对知性问题的阐释很感兴趣，坚持要我在讲话稿中把这个问题写进去。我说在此以前我已有文章谈过了，他说没有关系，可以在讲话稿中说明他对这观点的赞同。这篇讲话稿后来成为引发一次事件的开端。在这次事件中，知性问题虽然不是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也受到株连，被指摘为和权威理论唱对台戏，‘要回到康德去’。对于这种责备，我一直沉默着，现在也不准备回答。我只想对掌握意识形态大权的批判者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回避了我对‘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诠释呢？要知道除非在这个问题上将我的论据论证驳倒，你们是不能稳操胜算的。”

文章风波



书名：周扬传
著者：罗银胜
出版：文化艺术出版社

王元化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谈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问题。他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只谈从感性到理性，跳过了知性阶段，这是一个

史苑书摘



重要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否定之否定。长期以来，我们只讲一分为二、只讲差异就是矛盾、矛盾就是斗争，产生了斗争哲学，取消了多样的统一，造成极大危害。王若水谈的是异化问题。异化问题过去有人提出过，但没有成为广泛讨论的问题，也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它是一个不大会被人理解的哲学理念。这次王若水提出来，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虽说事隔多年，但王元化对在天津那几天的经历记忆犹新。在

讨论中，对于周扬有些见地，他非常赞同。周扬说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就理论准备不足。俄国民主革命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有普列汉诺夫这些理论家，而中国革命缺乏这样的理论家。我们往往只重实践而忽视理论，强调“边干边学”、“急用先学”、“做什么学什么”等等。

对此，王元化认为，周扬的意见是切中时弊的。我们向来对理论采取功利态度，这种轻视理

论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为中国革命带来很多问题。

王元化还记得，周扬在审稿时，对有的部分不够满意，让他在此基础重写。王元化受命后，只好挑灯夜战。而那时他已很少通宵加班，但为了赶时间，他也没什么怨言。

这篇文章在周扬去党校作报告的前一天，即3月6日的晚上，由周扬本人审定，进行了最后的润色，直到3月7日凌晨才匆匆印出。

因为连日的劳累，王元化当

天没有去会场，后来就在电话中问周扬反应如何，他说反响不错。报告会是由王震主持。报告结束王震和他握手讲得很好，还问周扬“异化”是哪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当时王元化也高兴，第二天就回上海了。王元化走后，不想事情急转直下。原定于3月9日结束的会突然延期，3月10日胡乔木找郁文、夏衍、王若水一起到周扬家里，提出了意见，由此逐步升级，掀起了一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